

领导人携夫人出访规则探秘

我们经常看到国家元首互访的新闻。每每这个时候,元首旁边总站着自己的夫人。第一夫人们或温文尔雅,或热情奔放,总在不经意的举手投足间博得万众目光,让冰冷的政治平添几分柔情与人性。第一夫人随丈夫出访,不只是站在丈夫的背后,她们通过自己的个人魅力帮助提升丈夫的形象、国家的形象。

建国后的出访惯例:
社会主义国家不带夫人 非社会主义国家带夫人



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访

1963 年,王光美作为国家主席夫人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这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携夫人出访。一袭白色旗袍的王光美,端庄华贵,光彩照人,轰动了海内外,为中国外交与世界接轨开了个好头。据王光美回忆,建国后,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出访社会主义国家不带夫人,而出访非社会主义国家则要对等。她的说法得到一些老外交官和学者的证实,他们认为

朝鲜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拥有核武器?其实拥有核武是自朝鲜建国以来一以贯之的国家战略。

金日成的核梦想
朝鲜拥有核武器的想法由来已久,从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起就已经埋下了核基因。

在朝鲜战争战场上没占到便宜的麦克阿瑟不止一次恐吓称,要使用核武器攻击朝鲜或中国大陆。据史料记载,当时金日成得知这一消息后,因为没有对等的反制手段而极为焦虑不安。朝鲜是一个缺乏能源的国家,境内不产石油,煤炭的储量有限,相反却有丰富的天然铀矿,石墨储藏也名列世界前茅。国际局势加上国内需求,坚定了朝鲜进行核研究的决心。

朝鲜“核武器之父”徐相国
在研制核武的目标下,朝鲜开始对核研究投注了更多资源。

1955 年,朝鲜在平壤建立了第一个核物理研究所。1959 年后,超过 300 名朝鲜留学生被派往苏联学习核物理。在上世纪

当时对于领导人出访是否带夫人并无明确规定。

江泽民开始,携夫人出访制度化
刘少奇开创了中国国家主席携夫人王光美出国访问的先河,但那时,这并不是政治常态。将之制度化的,还始于江泽民。

1994 年 9 月,江泽民携夫人王冶坪飞赴欧洲三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观众从电视上第一次看到了王冶坪和蔼、慈祥的面孔。至此,我国领导携夫人出访才渐渐多见。2003 年 5 月,胡锦涛就任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夫人刘永清陪同出访,她的微笑给西方媒体留下深刻印象。

展现人性化细节,成丈夫“加分利器”

胡锦涛和夫人访问日本从江泽民携夫人出访之后,中国外交部已开始认识到向国际媒体展现国家领导人正面形象的重要性。其中可以使中国的形象人性化的一个方式,就是领导人带夫人出访。胡锦涛刘永清夫妇伉俪恩爱的形象给世界留下美好的印象。2008 年 5 月 9 日,胡锦涛在访日期间前往工厂视察时,刘永清一番极具专业水准的评价令现场的人员都深感意外和敬佩。有日本友人注意到,站在一旁的胡锦涛主席听到夫人的话后不停地点头并露出欣喜的笑容。“当时我就觉得,胡主席一定是一个爱妻型的领导人。”

从夫人们身上了解的国家更生动:王光美一袭旗袍让西方人产生新鲜感

领导人的夫人们往往成为世界人民了解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以及他们的文化的重要渠道。世界上,男性政治人物大同小异。但是她们的夫人们却不同。无论是服饰、表情、容貌,还是才智,都更能反应她们所代表的国家的人民、

朝鲜如何发展核武

五六十年代留苏的这些学员成为朝鲜核开发活动的骨干力量,包括朝鲜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原子能工业部部长崔学根,研究与核武器直接相关的核反应堆物理学的丁根,以及日后的朝鲜“核武器之父”——徐相国。

徐相国被称为“科学天才”,是主导朝鲜核武研发计划的灵魂人物,也是朝鲜“大浦洞-1”型导弹的主要研发人员。1966 年,徐相国从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后就留学苏联,28 岁时在苏联获得博士学位。苏联曾劝他加入苏联国籍,但徐相国婉言拒绝,回归朝鲜。

代号“家具工厂”的援建计划

1962 年苏联专家克多洛夫等人应邀来到朝鲜北部的山区,建造和平利用核能的设施——宁边核能研究中心。克多洛夫在冷战结束后接受采访时称,在这里他和其他苏联专家将核技术传授给朝鲜,同时

精神面貌、文化传统和生活水平的真实情况。

“作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出国门的第一夫人,王光美仪态优雅,充分显示了东方女性的神韵,为出访增色不少。”当年作为外交部亚洲司陪同出访的工作人员这样评价。在那个一切以政治挂帅、以艰苦朴素为荣的年代里,一袭旗袍、一串项链的王光美的出现,无疑既给色彩单调的国人带来一缕充满人文情怀的温馨,也对原本畏惧红色中国的西方人产生了一点新鲜感。

刚柔并济都因国家利益:宋美龄游说美利坚 小布什之妻帮普京整衣领

在抗战期间,宋美龄以中国“第一夫人”的身份赴美国会发表演说,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经由电台转播全美,一时震动了整个美国,千千万万的美国人以一睹其风采为荣。二战后期,宋美龄又陪时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等领袖讨论日本战后处理问题,并达成协议战后日本需归还台、澎、金、马等地。

领导人夫人之间的亲切问候或交往可以或多或少增进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友谊,降低或化解相互可能的敌意。2007 年 7 月,小布什邀请普京访问自己的家乡德克萨斯。小布什太太劳拉与普京夫人亲密交流,帮助普京整理衣领。试想一下,两位总统夫人亲热得像亲姐妹一样,小布什与普京的关系能坏到哪去?受益的当然是他们各自的国家。

身体力行投身公益:告诉世界,国家关切什么

领导人的夫人们还会通过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公益活动展现自

他也为朝鲜青年研究人员的核研究水平之高感到非常吃惊。苏联专家秘密建造了一个型号为 IRT-2000 研究型的轻水反应堆。在朝鲜的强烈要求下,在往来文件上,这个援建计划被代号为“家具工厂”。

1965 年核反应堆建成,苏联专家离开宁边归国。这个轻水反应堆建造前,朝鲜从未如此深入地接触核技术。

加速核武开发

苏联解体后,原苏联的核研究人员大量失业。朝鲜充分利用这一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将数十名前苏联核科学家聘请到本国工作。

苏联解体后,国际核黑市活动猖獗,朝鲜抓住了这个机会,四处搜集、购买核技术,同时还伪装成合法的贸易公司化零为整购买所需零件。朝鲜还与巴基斯坦“核弹之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建立了联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曾指出,宁边核反应堆的铀提炼技术处处都有“巴基斯坦制造”的印记。 《老人报》2013.3.24 文 / 周斌

己和国家的形象。在这方面,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和现任总统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的表现显得出类拔萃。

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妻子的彭丽媛,也在自己关注的公共健康领域做出了切实的贡献。2009 年 10 月 13 日,彭丽媛被中国控制吸烟协会聘请为“控烟形象大使”。同时,彭丽媛还担任了“全国结核病防治宣传形象大使”。彭丽媛与艾滋病致孤儿童结缘,已经有多个月头了。2011 年 6 月,彭丽媛又担当了世界卫生组织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

事实上,根据个人专业背景、业余爱好的差异,“第一夫人”们在首脑出访中扮演的角色各有不同。一些“第一夫人”在首脑出访中的作用体现出较为专业的色彩,例如,前往医院、学校;而另一些“第一夫人”的形象则更加亲和,表达了对东道国文化的尊重,如前往餐馆、博物馆,突出女性魅力和感召力。

“夫妇同访”提升国家软实力

事实上,在一些国家,“第一夫人”承担外交职能的情形甚至已出现制度化的特征。如美国“第一夫人”会在总统度假地戴维营招待来访政要全家,已成“固定节目”。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张小劲教授认为,携带夫人进行外交活动,无论是对本国国民,还是对东道国民众,都能起到去除“第一家庭”神秘感、以首脑家庭的和谐融洽树立良好形象的作用。现代首脑外交往往同时兼具公务外交和礼仪外交双重功能,而首脑配偶们在外交活动中的良好表现,能够增强一国公共外交的效能,提升“软实力”。

搜狐网 2013.3.21 文 / 辛闻 王艳

林彪因“厌倦政治”曾三番五次自杀

抗美援朝时期,林彪在莫斯科以治病为名,带着妻子儿女长期不归。医生出身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认为,林彪没有大病,属于小病大养。

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认为,“林彪身体很好,没什么大病,所谓有病,完全是精神作用”。

另有中国名医和苏联医学专家认为林彪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但遭到林彪本人和叶群的否认。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委托他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去看望林彪。王鹤滨看过之后,问同在那里的朱德的保健医生翁永庆大夫:“林彪患的是什么病?”后来,王鹤滨回忆说:“我当时怀疑林彪患有精神分裂症,因此发出提问。我一进到林彪的卧室,他给我的视觉印象就是精神上的症状。”林彪的保健医生蒋葆生也认为林彪有精神病。别人问起林彪的病情,他曾悄悄地对人说:“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有人说林彪有精神病,苏联专家也说过,叶群一听就火了,把这位苏联专家赶回国了。还有一位老同志,他在延安时就是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原来是胡宗南的医务官,他也说林彪有精神病,也被叶群赶到西南地区的一个医学院去了。”

长期在林彪家工作的服务员王淑媛也认为林彪精神不正常。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曾目睹一次林彪触电门自杀的反常举动,是她及时救了林彪一命。

说林彪有自杀倾向的不止王淑媛,林彪秘书张云生说过:“中共九大前,林彪曾想自杀,他厌倦了政治。”林立衡也说过:“林彪曾经想触电或吃安眠药而死,他贮藏过安眠药,还曾吃过钡——他以为钡有毒,吃了可以致死。”

21CN 历史 2013.3.27

“四人帮”倒台后陈伯达最令人叹息？

陈伯达真正的垮台,是在“文革”时期。1966 年“文革”开始后,他到《人民日报》,当场写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文章,在我看来不是陈的风格,甚至不是他的思想,这样的文章不经过别人看就发表出来,我有点怀疑。想想看,如果错了,他陈伯达有几个脑袋?(陈伯达晚年说:这篇社论是《解放军报》两位编辑写的,陈伯达审定并改了标题,当时在京几位政治局常委看过。)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无法无天的紧急总动员令,这个口号是颗炸毁全国的原子弹。历史证明,这篇文章一出来,陈伯达的历史作用也就完了,这个“横扫”其实包括了他在内。因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就没有可以再扫荡的东西了,今后就不用委托你陈伯达再写加码的专文去扫荡什么了。

他成了中央文革的组长不久,江青就

代替他当代组长了。用中国古话来说,狡兔死,走狗烹。他这篇文章一来,把已经打倒的、正在打倒的、准备打倒的,都扫光了,因此陈伯达的作用也就没有那么大了。而要专挑小刺,陈伯达可不行,比江青手下的姚文元等差远了。

所以,不是 1971 年庐山会议批评他后,他才不重要了,而是在这篇文章以后他就不重要了。不仅如此,这篇文章以后,他的活动,反而变成了他罪行的材料,说他是为林彪服务,破坏了毛主席的威信,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头上。“文革”的事,是江青在那里指挥,陈伯达根本不会做这些事。你叫他做行政指挥,他做不了,他至多只能指挥他的秘书替他收集资料,他来写书。陈伯达要是离开了柴沫(行政秘书)、田家英、史敬棠、何均、陈真这五个人,他就什么官也不会当,什么书也写不出来了。

后来,在 1970 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

为了在宪法里设立国家主席这一条,陈伯达又被牵连进去,从此他就被打倒了。他成了林彪集团的头目之一,又成了反革命。

陈伯达这个人,留下的教训是很多的。他十分有才情,但他没有去做学问,他完全为了当时的某种政治需要服务,为了他个人的上升需要,他就用文章、用书籍来响应,改造历史事实来发挥他的论点,而不是把自己的历史论点建立在事实上。所以陈伯达的一生,虽然写了那么多东西,今天看来,在学术上有根据、能站得住的,怕很少。

不过,在判刑的人当中,最令人叹息的还是陈伯达。他不属于张春桥、姚文元这类人。陈伯达的一生,颇令人叹息,但他却不能算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很有才情的人,最后却成了反革命的头子,确实是一场大喜剧。

《领导文萃》2013 年第 6 期文 / 曾彦修